

|| 西南联大讲堂



罗 庸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罗庸 西南联大授课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西



罗 庸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罗庸 西南联大授课录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 罗庸讲述; 郑临川记录;
徐希平整理.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4. 9
(西南联大讲堂)

ISBN 978 - 7 - 200 - 10789 - 0

I. ①罗… II. ①罗… ②郑… ③徐… III. ①中国
文学—文学史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30946 号

· 西南联大讲堂 ·

罗庸西南联大授课录

LUO YONG XINAN LIANDA SHOUKE LU

罗庸 讲述 郑临川 记录 徐希平 整理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25 印张 133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0789 - 0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罗庸先生唐代文学史研究述略

徐希平

罗庸先生讲稿，临川师精心珍藏半个多世纪，1999年，蒙临川师应允，笔者校订并油印少许，作为研究生参考资料，深感受益匪浅。2002年，受临川师重托，将罗庸与闻一多先生西南联大授课记录稿重新校订，合编成《笳吹弦诵传薪录》，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转瞬十年过去，其书已不多见，此次北京出版社列入《西南联大讲堂》出版，十分可喜，必将沾溉后学，为促进学术提供有益的启迪。现仅就罗庸先生有关唐代文学史论述部分之基本要旨及其特点略陈管见，以见其学术价值和意义之一斑。不当之处，还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罗庸先生有关唐代文学史的研究论述中突出地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一、彰往察来，推动文艺繁荣与学术进步，是中国文学史和唐代文学史研究的首要任务

罗庸先生到北大任教之前，曾长期从事诸子、佛学、

儒学的教学研究，历经认识上的苦闷曲折，而后受梁漱溟笃行学说之影响，“深切感到儒学要在力行亲证，决不许你徒腾口说”^①；“儒学是求仁得仁之学，要在力行，才有入处，大家如能在躬行日用上改过迁善，反己立诚，以体验所得，反求之《论语》那便是终身受用不尽”^②。由此形成罗庸先生为人严谨务实、反对虚空浮华的基本态度，并直接影响其唐诗研究。

1932年后，罗庸先生到北大任教，开始研究和讲授诗词与文学史课程。经过近十年的潜心研治，认识不断深化，在结束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介绍，转入唐代文学史分期研究之前，罗庸先生特地在叙说中开宗明义，提出首要重大问题，何以要研究文学史？然后旗帜鲜明地反复阐明其主张和观点：

“吾人之目的，在求新文学史之出现，推动学术之进步。”

“研究历史如仅知道既往及遗产，则无多意义。夫历史之重要任务，在彰往察来，如中国近代文学成立近三十年，诗与戏剧不能树立固定作风，欲知其前途，则不能不彰往以察来，此历史家之责任也。”

罗庸先生关于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这一认识，在今天已不算新论，当代学者类似之论不乏精辟之见。

罗庸先生观点之可贵，并不限于其本身的深刻内涵，还有着更广泛的积极意义。这主要表现为：其一，罗先生立论时的20世纪30年代，正值现代概念上的文学史研究起步不久，探索草创，体例混乱，有关文学史研究目的与意义的认识也较模糊，各执其说，莫衷一是，故罗庸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观念，必然起到积极的作用。尤其是罗庸先生在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讲坛宣传这一重要观点，对于引导新时代文学史研究向正确方向发展，无疑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并已为后来文学史研究实践所证明。其二，罗先生论点之提出，不是凭空妄言，而是根据当时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并结合新文学如诗歌、戏剧实际情况，深入考察，认真分析，总结中国文学发展流变、繁盛兴衰的规律，有感而发，切中要害，从而提出文学史研究正确的发展走向，进而为新文学继承创新和繁荣奠定基础。其三，治学为着推动学术进步，这并非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其一贯的基本主张，有着深刻的理论思想根源，其基础仍出于罗庸先生所信奉的儒家求仁力行之说，强调“为己”之学，即主张为学不求虚名，不为世俗浮华所诱动，应重在切实致用，解决具体疑难和实际学术问题，此亦为当年西南联大时期大批老一辈学者共同的鲜明特

点和优良传统，陈寅恪先生也正是由此出发，大力倡导独立的学术品格和精神，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

二、文学研究须力戒浮华虚空，减少重复因袭，勇于开拓创新，道前人之所未道

这个问题与前者紧密联系，也是文学史研究必须重视、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罗庸先生之所以强调彰往察来，是因为感觉到当时文学史研究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其原因即在于缺乏创新，故罗先生指出：“中国文学史之研究，自与西洋文化接触后即开始发生，迄今三十余年矣，有价值之著述当在七十部以上。然皆陈陈相因，无多进步，此文学史之不可不研究也。”表明了罗庸先生对于开拓创新意识的鲜明态度。

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罗先生充分发扬了勇于开拓、大胆创新的精神。有关唐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就显出其独辟蹊径、别具特色。

首先，在讲授提纲方面，罗先生没有因循旧有的突出介绍所谓正宗诗文，而对其他文体和文学现象忽略轻视、一笔带过的常见方法，而是将比例做了较大调整，诗文与各类文艺形式并重，按初、盛、中、晚四段分别讲述，每一讲都于诗文之外，其他相关艺术样式或文化

环境的介绍也都要占相当的篇幅，有时甚至超过诗文。如第一讲诗文方面仅介绍初唐四杰、沈宋、陈子昂、张九龄，另一大半篇幅介绍南北朝文学之回顾、隋唐的科举与士风，唐初南北文风之残存、唐初的子家和史家等；第二讲共三个问题，其三为唐诗及盛唐诗人之总论，另两个问题分别为有关胡乐胡舞之介绍，特别对于胡乐之流行与雅乐之消亡做了详尽的探讨。此外，关于中唐、晚唐两个阶段的介绍也多如此，均与其他文学史的基本框架有所不同，除传统诗文之外，还对小说、戏剧、音乐、舞蹈、民间讲唱艺术等各类文艺形式留下相当的篇幅，予以较详细的介绍。这种布局的合理性自然可以商讨，但其自成体系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它并不意味着取消或否定诗文在唐代文坛的特殊重要地位，而是因其大多已为人所共知，补充有关环境和相关文艺样式的介绍，既可让学生把握各阶段文学体裁发展流变脉络，更有助于对诗文繁荣原因的深切了解和认识。

其次，在具体评介唐代文学各类文体时，罗庸先生对于那些新起的文体予以特别的关注，这从第三讲的题目和内容即可略见一斑。按传统文学史家观点，文学发展至中唐，文坛已由盛唐巅峰跌落，昔日荣光不在，但罗庸先生对中唐文学却给予高度评价，尤为重视其创新

成就，故该段题目即为“中唐文学之创新与复古”。在韩柳古文、元白新乐府之前，先特别详尽地评介“传奇文”“俗讲及其他俗文学”“曲子词”这“中唐的三种新文体”，并仔细分析其与传统文学的关系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如认为“传奇小说与唐乐府关系极密切”“传奇影响最大者第一为戏剧，至今犹活在民间，为宋元以来杂剧、传奇之蓝本”，同时还对古文家、话本，以及小说戏剧不可分局势形成等均发生积极影响。由此透出其之所以对其特别重视的缘由。

这种积极探索，力避因袭的意识，与陈寅恪、闻一多等国学大师争道前人所未道的创新精神十分切合，也使其在分析各类具体文学现象、文学流派时，能够变换思路、探源溯流，鞭辟入里、新见迭出，给人启发和耳目一新之感。如关于曲子词起源之新推测，提出探源可循之二原则：“其一，凡文体发源于音乐出来的，探源时当自音乐入手；其二，凡文体成功一新形式时，颇难观其本来面目，吾人探源时必追寻其未完整时之旧面貌而得结论，因知文体之起是多元而非单纯的。”在此基础上，罗先生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来源，虽然并不意味着其为定论，但相对于有关词之起源众多各执一端的争论而言，罗先生的见解无疑是较为通脱的。

再如其论诗圣杜甫一节，亦可谓言简意赅，分析其诗歌体裁、技艺、风格发展演变五个阶段，十分精辟。①长安十年，努力做五律，欲因以出人头地，后试作七言，然绝不作当时之乐府调；②安史之乱后，见民生疾苦甚多，非旧体所能包容，乃仿汉乐府以命篇，诗境得以开展；③暂定居成都，练习五古，大功告成，与初唐诗异趣，创造出独特风格；④到夔府而七律臻于成熟，各有文法，绝不雷同，登峰造极；⑤此后则为强弩之末，无甚可观。对每一个阶段文体变化及其原因均有透彻之分析，强调杜诗以三、四期作品为佳，切实可信。最后补论杜甫晚年多排律之因，谓其“流浪湖南一带，多用左手写作，为打秋风计而多写排律”，将其文体改变与生活紧密联系，亦不为未见。

此外，如论“传奇”名称读音，“传读去声，盖以传记体文字而记述异怪之事”；论健舞不一定为男子，软舞不一定为女子；剑器与剑舞有别，剑舞确为以剑作舞，军中宴会常用之等许多观点，皆为深入考察思索而得，或论证充分，或自成其说，皆有启发借鉴之效。

三、中唐时期乃中国文学发展的分水岭，文体的发展演变犹如生物之兴衰代谢，其动力则主要源于民间和外族

中国文学绵延数千年，多以传统诗文即所谓“文”

“笔”为文体之正宗，其内部又有若干体制，如诗之古近体、五七言、律绝，文之书序启状、碑志诔铭，种类繁多，各有法则，按《文选》即可分为三十九大类，而诗文之外，体裁更是丰富多彩，小说、戏剧、各类民间通俗文学，不胜枚举，后者的出现和实际成就还使得诗文独尊、独霸文坛的局面得以发生巨大的改变，取而代之，推动和影响后世文学的持续发展。传统诗文和各类新兴文体有一个交替共荣的转换阶段，罗庸先生认为隋唐迄于南宋约七百年间，便是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分水岭，大规模的取代尤其明显集中地表现于中唐时期，“唐初承六朝门阀之旧；其后（盛唐）乃削平之，而平民文化与朝廷文化得以交通；渐次平民文化居上，吾人于本段中唐史实仅见平民时有创获，朝廷转寂无所闻，此与汉魏之朝廷文学大相径庭，亦中国文化之绝大转变也”。

基于对唐代文学这一特殊地位的认识，罗庸先生以整个中国文学流变史作为参照，将二者进行对比考察，认为唐代文坛交通并存的古近各类文体相互影响、代谢更新的现象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典型集中地代表和反映中国文学发展共同的基本规律。“此段文学，上足以解说汉魏六朝文学何以结束，下足以说明清文学之所由形成。”因此，特别对唐代文体发展演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

讨，以求有益于对中国各类文体和文学继承发展规律的认识思考。

罗先生通过大量具体的事实剖析，总结出认识把握文体新变的规律与原则：

其一，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去除孤立静止的意识，了解文体兴衰交替之客观规律，不可避免。罗先生指出：“一体文学之演变，当以有机体视之，勿以为死板之事实。故以生物学眼光治文学史，为利滋大。植物初生，一片绿芽而已，既长乃能辨出为草为树，发枝开花，结果而后名目，秋后则有枯萎以致消灭。文体之发生消长，理与此同。一体文学之生灭，其间转变犹抛物线然，一体由发生至消灭，而另一新体取而代之，长此递变不绝。”

其二，新陈代谢过程中新体裁的源头主要来自民间与外族。“生命体之来源何在？一体文学既旧，新体何由产生？余以为凡二来源：1. 来自民间，2. 来自外族。持此可打破历史上毫无依傍之天才创作之迷信。如《诗经》灭而楚辞兴，楚在当时为南夷，由此而有汉赋；再四言既敝，五言代起，此难缘于乐府，乐府实民间之产物也；五七言既敝，则词发生，词缘于大曲，曲为西域之乐，又为来自西域之明证也。”

罗庸先生在具体考察研究后得出以上原则，又尽力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唐代文学史研究中，特别注重有关民间文学和外来文艺形式与文学的关系，注意此两方面因素对文学的影响。

民间俗文学方面，如论唐代俗讲、俗赞等对后世文体影响有六：“1. 俗讲本子至北宋而变为话本，又演成词话（带说带唱）、平话（有说无唱）、弹词（唱多说少）。2. 七言赞为元白新乐府之来源。3. 和声赞与当时“竹枝”有关。4. 五更转、十二时演为后世词调俗曲。5. 茶酒论演为后世合声话本。6. 老少问答影响中晚唐诗体裁甚大，如卢仝《萧氏二三子赠答》是民间风格为诗人所借用者，香山亦有《池鹤》八绝句，晚唐皮陆集中此体益多矣。”

论民间文学影响如此深入详细，在 20 世纪上半叶，并不算太多，其独到眼光由此可见。

论外来文化之影响，同样十分详尽而具体，罗庸先生所讲的“外族”含义十分广泛，实际上包含中原之外的各少数民族，也指世界各国各族，广义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保持活力具有特殊的影响和意义，正如闻一多先生在对比四大古文化结局后所指出的那样：

“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太怯于‘受’的，所以还

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也仅仅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③

正是本着这类似的观点，罗庸先生以充分的论据，说明了外来文化对文体新生的积极影响，展现唐代文学勇于“受”的事实和成就既有宏观综论，又不乏个体剖析，前者如第二讲“开元天宝之国势与文学”中，首先概括南北地理、心态与文化差异。“南朝人目光皆集中长江之东西，然极西之上峡风物亦未企及，故心胸极为狭窄。北朝与西凉交通，迨隋唐而益盛，人心目中之北方遂成胡汉杂居之文化局势。”紧接着又简洁叙述东北之契丹奚丹及高丽文化、西域突厥文化及西洋中古文化、西南吐蕃文化、岭南交趾文化会聚长安的盛况。在此基础上，“长安成为当时亚洲文化之中心，所有文学艺术皆先在此地孕育，再散播其种子于各地”。逻辑清晰而严密，合于事理，真实可信。

在论述盛唐文学成就时，罗先生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详细讨论胡乐之流行与雅乐之消亡这一重要问题，分别从“唐代乐舞变迁的五个时期”“十部伎与三大舞”“坐部伎与立部伎”“清乐曲调之残存”“四夷乐之内容及主要胡舞”“舞曲组织及其曲辞”等多方面予以论析，

条分缕析，深入浅出，且材料极为丰富。例如其四夷乐内容及主要胡舞一节，列表比较龟兹与西凉复杂的乐器，同时与中原清乐相对应，繁简之中，影响与差异亦自然见出。

至于论外来文化对唐代诗人的个体影响，最具典型者自当推陈子昂与李太白，故谓“唐有二文人身世特殊，子昂与太白是也”，“太白一生行迹，多与国人伦理观念不甚一致，故身世极为可疑。前此相类者有陈子昂，二人生活习俗均不受中原传统之束缚，故能任使其气而独步一代”，可谓独具只眼之见。

另外，罗庸先生还对译经、造论及纪行、禅宗语录、诗僧与僧诗等“唐代佛教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对日本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对于保留唐代通行文献和促进文化交流的价值给予了客观评价。

四、唐代文学成就主要得之于时代，故研究亦应注意其共通性，并注重考察作家与前人之异同

唐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成就辉煌的时代，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便是诗人众多、名家辈出、群星璀璨，作家之考察自然为文学史研究的着重点。考察之方法多种多样，传统学者往往偏重于单个作家自身的深

入研讨，包括其身世与社会环境、作品题材内容及艺术成就等。罗庸先生认为这种方法有其特色，但亦有其弊病，主张加强作家的比较研究，纵横贯通，竟委穷源，找出彼此的共同点与差异，略同详异，以突出其不同贡献。罗先生在总论唐诗时，先总结前人方法之利弊而后指出：“国人所著文学史，其态度与正史作家无异，均以作家为主，重视其社会背景，此法易流于呆板，本课针对此弊而矫正之，但于某一时代中找其共通性，至于作家之分述，可略则略之，盖某一作家之成功，其本身力量仅占十分之一二也。”

这段话实际上讲出了三层意思：第一是指出了传统教学研究方法的局限，即角度狭窄、手法单一、孤立探讨、千篇一律；第二则是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办法，作家研究不必面面俱到，大同小异地分别重复叙述，而应找出共通性，尽力概括出在同一社会环境下各个不同类型诗人的精神风貌及其作品所表现的基本特征，以反映出社会背景和时代对于作家心理与创作的总体影响；第三尤须在对比分析中注意发现作家与前代或同代作家彼此不同的个性，并作出客观的评价。

以盛唐文学史研究为例，罗先生总命题为“开元天宝之国势与文学”，其基本观点即已显见，该讲共讨论三

个问题，首先论“胡乐胡舞及其曲辞”，其次论“胡乐之流行与雅乐之消亡”，内中又详细探讨唐代乐舞五个时期的变化，清乐与雅乐以及舞蹈的具体情形，表现其对诗歌的种种影响；最后总论唐诗，十分精练，重点突出。初盛中晚四期之中，分唐诗内容为十二类，曰宫廷诗、赠答诗、园林诗、行旅诗、征戍诗、声伎诗、杂戏诗、僧道诗、异俗诗、书画诗、田园诗、类书诗等，分别予以总体简评。然后再将王、孟、高、岑、王昌龄、王之涣、綦毋潜、刘长卿等重要诗人略加比较，以笔调形式及题材多样性与风格变化等方面标准评价，认为“唯王维足称大家”，结尾专节论李杜，仍然是将重点放在考察其诗歌之渊源及创新贡献，避免了平铺直叙，可谓详略得当。

扣住时代脉搏来考察作家总体风貌，也就紧紧抓住了根本，着墨不多而让人了解其概略，印象鲜明深刻。而在进一步的具体考察中，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必先说明作家之来踪去迹，考其同于前人者若干，异于前人者若干，能如此或可勉成精心之作”。这一观点在罗先生论述李白的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论曰：

“(太白)五言诸作多得力于建安之曹、阮二家，